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儒学系列讲义
主编：周桂钿

春秋

经传

讲义

赵伯雄 著



人
社



『春秋』 经传 讲义

赵伯雄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崔秀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经传讲义/赵伯雄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儒学系列讲义)

ISBN 978-7-01-010948-0

I. ①春…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史籍-研究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0563 号

《春秋》经传讲义

CHUNQIU JINGZHUAN JIANGYI

赵伯雄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25

字数:27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948-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儒学系列讲义》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黄 进

编委会副主任 赵毅武 周桂钿

主 编 周桂钿

副主编 王心竹 刘丹忱

资助人 赵毅武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心竹 方国根 王葆玟 刘丹忱 乔还田 牟钟鉴

张学智 李之美 陈 昇 陈亚明 陈战国 宋志明

林存光 周桂钿 赵伯雄 赵毅武 俞学明 夏 青

郭 沂 钱 逊 黄 进 彭永捷

策划出版：方国根

编辑主持：李之美 夏 青

责任编辑：方国根 崔秀军

封面设计：田杰华

总 序

周桂钊

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是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儒学研究团体共同发起成立的。会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先生。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宗旨是“研究儒学思想,继承儒学精华,发扬儒学精神,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繁荣”。同时,为世界儒学研究学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10年后,2004年,谷牧会长年事已高,辞去会长职务,任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叶选平先生担任第二任会长,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先生与原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先生担任常务副会长。下设秘书处、学术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后又增设儒学普及委员会。后因健康原因,刘忠德先生不再担任常务副会长,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任常务副会长,杨波先生任副会长,赵毅武任常务副理事长,钱逊先生任副理事长。

赵毅武先生重视办学培养人才,愿意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创办儒学院。刘忠德先生曾任大学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对办学有经验,也有兴趣,但认为自己办学难度很大,建议与大学合作。联系几所大学以后,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对办国际儒学

院有积极性，一拍即合。经过几个月的协商，决定成立国际儒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提供硬件（办公室与教室），国际儒学院负责师资与经费。经费由赵毅武先生捐助。中国政法大学方面校长助理、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先生参加了筹备的全过程。国际儒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二级学院，院长是刘忠德先生。儒学院要办成“儒学特区”，作为学会与大学联合办学，进行儒学教育的试点。我们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探索者、实践者开始工作。后徐显明先生调任山东大学校长，黄进先生从武汉调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校长。黄进先生对儒学比较熟悉，也有热心，使国际儒学院可以继续顺利办下去，也使我们对国际儒学院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如何培养儒学研究者和传播者？不能只靠听课读教材。既要提倡读儒学经典，深入思考，开展课堂讨论，也要请国内外儒学研究专家开讲座。还有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教学与学术活动相结合。除了听课，尽可能多地参加关于儒学的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是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简称儒联）的活动，因为儒联是合作创办单位，也是领导单位。2009年儒联召开国际大会，儒学院的研究生全部参加服务工作，让他们有机会与全世界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接触，有机会听到他们的高见。北京国子监孔庙是儒学教育基地，儒学院的研究生们经常参加那里的祭孔、敬老、尊师等各种活动。在北京各高校召开的与儒学有关的学术会议，也让研究生尽可能去旁听。山东泗水尼山书院开展会讲活动，儒学院的研究生们多次积极参与，收获很大。教师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也向同学们介绍会议情况。二是“为己之学”。儒学的特点在修身。学儒学首先强调修身，就是要用儒家精神，培养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素质，将儒学的优点变成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这是“知行合一”。要

努力避免“为人之学”，只能跟别人讲儒学的知识，自己不能践行儒学精神，不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2006年10月21日，国际儒学院召开理事会暨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国际儒学院的办学与其他各项工作。教师多数是从北京各高校与研究机构聘请的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来担任，第一批兼职教授11位，他们负责授课与指导研究生。他们的职称都是教授，多数是博士生导师。2007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现已招收六届，毕业三届。课堂不采取“满堂灌”的单向灌输方式，而采取讨论交流的形式，注重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会学习与研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也请学生对授课教师进行评估，并有评语。我们从教学效果较好的课程中选择部分讲义，作为国际儒学院的《儒学系列讲义》出版。任课教师将讲义重作修订，又请同行专家评审，再参考学生与教师的意见进行修改。经反复修改，最后定稿。这一系列讲义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儒家经典课程，如《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大学》与《中庸》等；二是儒学史课程，如“中国儒学概论”、“先秦儒学史”、“经学与玄学”、“理学与心学”、“中国儒学研究方法论”以及儒学专题如“简帛中的儒学”等；三是儒家课程，如“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冯友兰”等。现在出版第一批《儒学系列讲义》共6本：赵伯雄的《〈春秋〉经传讲义》、钱逊的《〈论语〉讲义》、陈昇的《〈孟子〉讲义》、陈战国的《先秦儒学史》、林存光的《孔子新论》、周桂钿的《董仲舒研究》。这些讲义都是教师研究儒学的重要成果，再用通俗的语言向学生讲授，最终形成讲义。这些讲义都是比较严谨的、有创新性的，又是比较通俗的，但不能说没有错误。因此，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其他讲义。

目 录

第一讲 《春秋》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 1
一、“春秋”名义简说	/ 1
二、《春秋》的形式与内容	/ 5
三、《春秋》的今古文问题	/ 8
四、可信而并不完备的鲁史	/ 10
五、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 12
六、孟子的《春秋》观	/ 18
第二讲 “三传”是怎样解经的	/ 22
一、关于“三传”的基本知识	/ 22
二、三传解经之比较	/ 27
三、三传之同源与异流	/ 32
第三讲 《左传》的作者、成书时代及相关问题	/ 39
一、《左传》的作者	/ 39
二、《左传》的成书时代	/ 41
三、《左传》的编撰过程	/ 48
四、左氏处理史料的方式	/ 54
五、《左传》与《国语》之关系	/ 57
第四讲 《左传》中的“无经之传”	/ 61
一、“关联传事”与无经之传	/ 61

- 二、编年记事产生无经之传 / 64
- 三、《春秋》阙文与无经之传 / 67
- 四、补充史实的无经之传 / 69

第五讲 《左传》的思想倾向 / 74

- 一、重礼治 / 75
- 二、重民 / 80
- 三、君臣关系 / 82
- 四、天道观 / 85

第六讲 《左传》的价值 / 88

- 一、经学方面 / 88
- 二、史学方面 / 92
- 三、文学方面 / 96

第七讲 汉代今古文势力的消长 / 102

- 一、《春秋》学成为汉代的“显学” / 102
- 二、汉世公羊学的传承 / 105
- 三、汉代《谷梁传》的授受源流 / 109
- 四、《左传》在西汉的传授 / 112
- 五、今古文学的分化 / 114
- 六、东汉今古文势力的消长 / 118

第八讲 《公羊》之义与董仲舒的公羊学 / 126

- 一、《公羊传》中的大义 / 127
- 二、董仲舒的公羊学说 / 138

第九讲 谈谈《公羊传》的“注”与“疏” / 154

- 一、何休的《公羊解诂》 / 154
- 二、徐彦与他的《公羊传疏》 / 164

第十讲 杜预的《左传》注	174
一、杜预其人及其著作 / 174	
二、杜预关于“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思想 / 176	
三、杜预关于“例”的理论 / 180	
四、杜注的得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185	
第十一讲 《谷梁传》与范宁的《谷梁传集解》	191
一、《谷梁》经义 / 191	
二、《谷梁传》的“日月时例” / 195	
三、范宁的《谷梁传集解》 / 199	
第十二讲 唐代的《春秋》经传之学	209
一、《春秋正义》的出现 / 209	
二、《春秋》经传之学在唐代呈现衰颓之势 / 213	
三、从折衷三传到舍传求经 / 216	
第十三讲 宋代学者与《春秋》经传	223
一、北宋前期儒学的中兴 / 223	
二、孙复与刘敞 / 225	
三、王安石的“断烂朝报”之说 / 232	
四、程颐的理学《春秋》观 / 237	
五、朱熹的怀疑与困惑 / 242	
第十四讲 《春秋》的第四传——胡安国传	247
一、胡安国及其学术渊源 / 247	
二、胡氏《春秋传》之成书 / 249	
三、胡安国的“史外传心要典”说 / 250	
四、胡氏《春秋传》之要旨 / 253	
五、胡氏《春秋传》的时代特征 / 255	

六、胡传成为了《春秋》的第四传	/ 262
第十五讲 清代崇尚实证的《春秋》之学 / 266
一、清代学风的变化	/ 266
二、从顾炎武看清初实学	/ 267
三、乾嘉汉学的《春秋》经传研究	/ 270
第十六讲 公羊学的复兴与近代改制 / 283
一、从庄存与到刘逢禄	/ 284
二、刘逢禄否定《左传》的解经性质	/ 288
三、开发公羊学经世功能的龚、魏新学	/ 291
四、康有为的公羊学与“托古改制”	/ 298
结 语 / 308
主要参考书目 / 313

第一讲 《春秋》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

一、“春秋”名义简说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春秋》作为六经之一,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在古人看来,所谓经典,都是经过圣人之手整理制作的、包含有为天下后世所必须遵循的制度和范式、承载着天经地义的道理的书,“经秉圣裁,垂型万世”,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春秋》自然也是这样。两千年来,解说、发挥《春秋》经义的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直至近世以来,人们才逐渐打破对经典的迷信,开始探究这些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探究的结果,人们发现,原来,在成为经典之前,《周易》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尚书》不过是上古档案的汇编,而《诗经》则是古代诗歌的总集;那么《春秋》呢?《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春秋》原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这在今日,几乎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了。但关于“春秋”的名义,还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要说的是,“春秋”最初可能是一种史册的通名。在中国古代,史官记事制度非常发达。《汉书·艺文志》上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所谓“君举必书”,表明君主的言论、行动都要被史官记载下来,为的是让国君谨慎自己的言行,同时为后世子孙作出榜样。当年鲁国的国君庄公要到齐国去“观社”,曹刿认为此举不合“先

王之训”，他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语·鲁语》）^①可见不管国君的言行正确与否，史官都是要记录下来的。除此之外，别国的大事，往往也要记载在本国的史册上。宋国的华督杀掉了国君宋殇公，他的后人说：“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左传·文公十五年》）^②卫国的宁殖伙同孙林父赶走了卫君，他临死前说：“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左传·襄公十五年》）这两个例子表明，发生在宋国、卫国的弑君、出君事件，也是要记载在“诸侯之策”亦即其他国家的史册上的。不过《汉书·艺文志》上所说的左、右史的分职，在《礼记·玉藻》中正好相反：“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实际情形究竟怎样，现在已很难考清，而且当时的史官是否分为左史和右史，现在也还得不到考古资料的证明，但是史官的职责是记录君主的言行与国家的大事，这应当是事实。

史官的这些记载，就形成了先秦时期数量颇为可观的历史著作。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就太子的教育问题访于申叔时，申叔时对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申叔时的这一番话，大致是说对太子要进行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等诸方面的教育，以培育太子的道德、改善他的性格、增长他的知识与才干。这里面的春秋、世、语、故志、训典，其内容可能都是一些历史记载^③，在今人

-
- ① 《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以下所引《国语》均出自该版本，只注书名和篇名。
- ②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以下所引《左传》及注疏均出自该版本，只注书名和某公某年。
- ③ 韦昭注云：“世，谓先王之世系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按世、故志、训典属于历史记载，似无疑问；所谓“治国之善语”，殆即今所见《国语》之类，也是历史著作。

看来,恐怕都应该归入史部;但其体裁不同,功用也不相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春秋”。

从上引《楚语》这段文字看,“春秋”不像是某一部书的专名,楚庄王太子所读的春秋,绝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经》。“春秋”在当时可能是一类史书的通名。《国语·晋语七》也提到,晋国的大夫司马侯向国君推荐叔向,让他去做太子的师傅,理由也是“羊舌肸(即叔向)习于春秋”,由于春秋记载了“诸侯之为(行为)”,这里面包括他们的善举和恶行,故而可以为国君提供借鉴,精通“春秋”的人也就有资格做太子的老师了。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①这“百国”的“百”字并非实数,却足以说明许多国家都是有“春秋”的。《战国策·燕策》载乐毅云:“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这里的“春秋”,也应是史书的通名。有时为了说明史书是哪一国的,则在“春秋”前面加上国名。《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的提法。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大夫韩起到鲁国去访问,“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礼记·坊记》:“《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都是“春秋”之前带有国名的例子。

这种当时许多国家都有的“春秋”,只有鲁国的传了下来,而且鲁史为儒家素所研习,随着儒家势力的张大,“春秋”也就逐渐成了鲁史的专名。当时有些国家的国史似乎还有各自的专名,《孟子·离娄下》云:“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说明与鲁国的《春秋》相当的,在晋国叫做“乘”,在楚国叫做“梲杌”。鲁史似乎没有别的名称,就叫“春秋”。

那么晋《乘》、楚《梲杌》、鲁《春秋》之类的国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史书呢?《乘》与《梲杌》俱已不传,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也早已不见了踪影,唯一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的,只有今日所见的原本是鲁史

^① 此为《墨子》佚文,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之附录。

的《春秋经》了。从这部《春秋》来看，编年记事是其一大特点，而且每项记事都只是极为简洁的一行文字：“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等等。《春秋》中的一条记事，少则几个字，多者也就是三四十个字，一般只记时、地、人、事，绝无枝蔓描写，绝无人物对话，也极少解释性的、说明因果的文字，几乎全不带感情色彩。这种记事方法，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册记事的通例。晋国的灵公被大夫赵盾的族人杀死，晋国的太史就在国史上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齐国发生了庄公在崔杼家被杀的事件，齐国的太史就直接记为“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年》）；还有前面提到的载在“诸侯之策”的“孙林父、宁殖出其君”，都说明当时各国史官记事，确有一种我们今日在《春秋》中所见到的记事法。这种纲要式的、编年大事记式的史书，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战国简策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作为晋魏史的《竹书纪年》。西晋杜预是亲眼见到过这批简策的，他在谈到《竹书纪年》时说：“（是书）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义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①杜预此语是用《竹书纪年》来印证《春秋经》，指出从春秋至战国，那种纲要式的大事记是各国史官记事的常法，并非晋国或鲁国所独有的。

至于这种编年大事记为什么被称做“春秋”，古来说法甚多，例如有的把春秋看做是“刑赏之书”，说什么“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故名“春秋”；有的说什么此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这些说法都不可信。比较起来，当以杜预所说最为合理，他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②意思是说这种史册的特点就在于编年，而古人于一年四季当中，往往“错举”春、秋二季以该其

①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②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余,这是由于“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公羊传》徐彦疏)^①,举“春秋”就可以代表一年了,进而“春秋”就成了编年史册的代称。当然,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直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记时的文字尚不见有春、夏、秋、冬等季节之名,因此,“春秋”之作为史册的名称,恐怕也不会早于西周。

二、《春秋》的形式与内容

前面已经说过,春秋本为鲁国的国史,是一种大事记式的编年史。作为经典,它的经文是一条一条的。《春秋》共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的史事。其间经历了鲁国的十二个国君,即所谓“十二公”。十二公的历年分别为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闵公2年,僖公33年,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春秋》止于此年,哀公实享27年)。下面我们仅以隐公前三年为例,看一看《春秋》究竟都记载了哪些类的史事。

隐公元年的经文如下: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蔑,《公》、《谷》作昧。邾,《公羊》作邾婁)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①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以下所引《公羊传》及注疏均出自该版本,只注书名和某公某年。

本年共有7条经文。第一条只记了年、季、月,而没有具体的记事。在“正月”之前有个“王”字,历来解说《春秋》的经师,大多在这个“王”字上做文章,以为这里头蕴涵有孔子的深意。不过也有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商周的铜器铭文中多有称“王某年”或“王某月”的,可能在年、月之前书“王”字是那个时代的习惯,用以表明所用历法是哪一国的历法(西周、春秋时各国所用历法并不统一,故有标明的必要),但这种表达的方式被解经的人说成了是孔子的“特笔”。第二条中的“公”是指鲁国的国君,也就是鲁隐公。在《春秋》里,凡是单称“公”的,都是指鲁国在位的君主。此事发生在三月,虽然也是春天,但正月既已书“春”,“三月”之前就不再著季节之名了。第三条是夏五月的事,因为四月无事可记,于是季节之名的“夏”就冠在了“五月”之上。这一条记的是郑国的国君在“鄆”这个地方打败了“段”的事,此事与鲁国并无关系,但也记载在鲁国的史册之中。第四条已到了秋天,天王是指当时的周天子,《春秋》中有的地方称“天王”,有的地方就单称“王”,并不统一。这也为后来的解经者留下了巨大的发挥余地。第五条“及宋人盟于宿”,“及”就是“和”,谁和宋人结盟呢?没有说,其实这说的就是鲁与宋的盟会,只因这是鲁国的史册,所以主体就省略不书了。第六条也是这样,“祭伯来”,来到哪儿?没有说,其实也不必说,因为从鲁国史官的立场来看,“来”自然是来鲁国了。第七条的“公子益师”是鲁国的大夫,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是用不着特别说明他是鲁国人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隐公二年的经文: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夏五月,莒人入向。

无骇帅师入极。(骇,《谷梁》作人旁)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